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林语堂先生一封亲笔函的翻拍件,信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出版商翻译外国书籍的,其中写到“敝友杨维铨”愿译某短篇小说选,“舍侄林疑今”愿译某集子等。杨维铨即杨骚的本名。信末时间写着“二月二十四日”,没有年份。我推断,这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写的。这封信读后,勾起我几许思绪。

许多年以前,我刚从南京一所学校毕业不久,有一回公干到广州。广州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父亲杨骚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于我有一种温馨和亲切。一天晚上,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北京路闲逛,从灯火的河流和人的河流中走进新华书店。我无意识地走动,在一架书柜最上层的角落,看到了上下册的《鲁迅日记》,请服务员取下来一看,还是精装本的,没什么犹豫,就买下了,尽管价格不菲。父亲杨骚与鲁迅曾有过交往,或许里面有什么记载,如果没有也无碍,看看伟人的日记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后来的情况说明还真买对了。

回到流花宾馆,躺在床上翻开《日记》,很快找到有关父亲的记录,远不止一处。《日记》里出现文坛赫赫有名的郁达夫、柔石等等,还有林语堂。说来不好意思,我还很不清楚林语堂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的书,只是片段地看到过一些贬斥他的文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远离政治、专事闲适小品文的文人。此时“文革”刚刚结束,想来应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对林语堂不甚了然。但有一个名字那天晚上我是记住了,叫林和清。

在1928年1月25日那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这样写道:“二十五日雨,下午晴。寿山来。林和清及杨君来。”《日记》后面的人名索引表明“杨君”就是杨骚。这则简短的日记里一个“及”字,表明林和清同父亲是一起到鲁迅家中的。这个林和清是什么人呢?脑子里出现一个盘旋不去的问号。

“文革”结束后,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回忆和研究杨骚的文章,只要我发现,都会搜集起来。忘了在哪一篇文章或何处提到了林和清,说他带杨骚认识了鲁迅。还提到了林疑今,说他们都是林语堂的亲戚,林疑今还是厦门大学外

文系主任。于是我到了厦门,这座美丽的小城离漳州很近。夜幕降临不久,我来到厦门大学西村一座楼房的二楼,同林疑今先生做了一番时间不太长的交谈。他是个和蔼的老人,在黄色的灯光下,他凝神地看着我,让人有点犯嘀咕。谈话中才知道,他认识父亲,很熟悉。30年代他同父母都在上海,有几次半夜时分,杨骚来敲门,原来同白薇吵嘴,跑来消气,消完气后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一宿。在林疑今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解开了那个问号。

原来林和清是林语堂的三哥,原是一名西医,却非常喜欢文学,同鲁迅认识较早,给鲁迅主编的杂志《奔流》写稿时用的笔名叫林憾。林语堂当时创办了《宇宙风》杂志,后来离开上海到美国,林和清接替弟弟主编这份杂志,此时名字改成了林憾庐。他倾尽全力于这本杂志,实际上是累死在这个位置上的,时为1943年2月。巴金写了《纪念林憾庐》的文章,通篇哀思绵绵,说他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正是他引领杨骚认识鲁迅,使杨骚从新加坡回国才几个月,便得到鲁迅的赏识和提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以自己一批作品获得文坛的认可。

林疑今先生是林语堂二哥林玉霖的儿子,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如今也已远去,但是他翻译的海明威著《永别了,武器》,自上世纪30年代起至今,一版再版,长盛不衰。1932年2月杨骚回漳州,途中给白薇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船中碰到疑今的弟弟们,听说语堂太太也回来了,坐二等舱,我没有看到她。疑今和他的父母仍在上海,三义坊20号。疑今的父亲今早到船上来看他的儿子,临时拿十块钱交给我,请我代他送给他的老母,听说他的老母已经七八十了,他言时竟眼泪流了起来,很是感伤的样子,一个上四五十岁的人,还会念起老母来而落泪,这回我算是初次见到。

林玉霖拿钱托杨骚带给漳州家中的老母,想来关系很好。

因为共同的志趣,又因为都是福建漳州人,同在海上文坛的老乡,杨骚与林语堂及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儿,都同鲁迅过往甚密。鲁迅在1928年9月27

## 杨骚与林语堂及其家人

□ 杨西北

日的日记里记载:“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盒。夜邀请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玉堂即林语堂。若狂即林惠元,是林语堂大哥林孟温的长子,也是个文学青年。4个乡亲一起到鲁迅家作客,又由鲁迅作东一起到饭馆吃饭,其乐融融,这情景也会让文坛不少人羡慕吧。

但是文坛不是一泓清水,不知道有多少是非的事情在不停地搅和。杨骚同林语堂有这一层的同乡关系,后来让人想不到会成为杨骚同鲁迅疏离的一个缘由。

这是1929年的一件事情。有一天,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杨骚等好些人在上海南云楼一起吃饭,席间,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的争执,大家不欢而散。离席后,鲁迅满腹火气还没有消,他要拉杨骚到自己家里,再叙谈叙谈,正好杨骚那天拉肚子,不舒服,没有同鲁迅一道回去。鲁迅大概认为杨骚偏袒自己的老乡,心里有了疙瘩。

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称这件事情为“南云楼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里也记下了此事。《鲁迅日记》1929年8月28日这么写着:“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讽,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我对这件“南云楼风波”的事颇为在意,耐心查阅了一些资料。因为从1930年起,《鲁迅日记》中杨骚的踪迹突然消失了,但他仍在上海,让人不解。在这之前的1928年和1929年两年中,《日记》中有关他的记载有69次之多,在当时文学青年同鲁迅的交往中是少见的。晚年杨骚同侄儿杨荣谈起同鲁迅误解的几件事中,“南云楼风波”是其中的一件。

这件已过去有80年之久的事情,缘起和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上海北新书局的李小峰拖欠鲁迅大笔版税,鲁迅提起诉讼,李小峰请来郁达夫调解,谈妥了将欠鲁迅的2万元版税分10个月付清。这天他们一起去南云楼吃饭,与此事没有瓜葛的林语堂酒后言多,讲到了张友松。张友松是原北新书局编辑,春野书店创办人。鲁迅认为林语堂提起张友松是讥讽他提出诉讼与张友松有关,因为张友松也想办书局。鲁迅亦有几分酒意,他脸色发青,拍案而起,连连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林语堂也不相让。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刊《回忆鲁迅及其他》,1940年7月宇宙风社出版)一文中,详尽地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

去脉,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中则说此事是“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度过了。”实际上,这件事导致鲁迅同林语堂两三年没有往来。

“南云楼风波”中鲁迅同林语堂的冲突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少有人知道杨骚因此事与鲁迅也生出了隔阂。这种误解他大约无法对鲁迅多作解释。

尽管出现过“南云楼风波”这样的事,短时间也无法抹去它的阴影,但他们终有密切的交往,在大的事情面前,在对待恶势力的残暴,他们依然是非分明,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前面提到的林语堂的侄子林惠元,曾是漳州进步学生组织“震中学社”和“非基大同盟”的骨干,“四·一二”后,为躲避迫害,远走新加坡,之后回乡又转到上海,同杨骚成为好朋友,他有时住在父亲林孟温家中,有时就同杨骚住在一起,也是鲁迅家里的常客。1929年,他回漳州组织进步团体“群学社”,同进步青年胡大机主编《爝火》月刊。3年后又接办《回风报》。后来《回风报》准备迁往厦门,杨骚也回漳州住了一段时间,要同林惠元一起办这张报纸,因为经费不足,此事最终没有结果。

1933年5月初,任福建省龙溪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的林惠元,没收了一批大宗的走私日货。不料这起走私与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有关,黄强企图用巨款收买林惠元,要求归还日货,想不到被林惠元拒绝。他恼怒之下,便指使手下诱捕林惠元,并立即枪杀。林惠元被押上车后大声喊冤,又被匆忙拖回,用短竹子将他的嘴撑开,不让他呼喊。当时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场景,林惠元被押赴刑场时,在车上挣扎着要讲什么的样子,但是嘴被竹子顶着无法出声。后来有尚存的老人记得此事的,提起仍充满惋惜之情。

林惠元被残忍地报复杀害的消息传到上海。当时漳州文艺青年蔡大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登门找林语堂陈述此事。林语堂和杨骚立刻行动起来,奔走联络了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道签署了《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署名的有柳亚子、鲁迅、郁达夫、傅斯年、叶圣陶、林语堂、杨

骚等20人。这份《宣言》于当年6月2日和6月3日先后在上海《大美晚报》和《申报》发表,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宋庆龄和蔡元培也分别向有关当局发了电文要求惩治凶犯。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林惠元的冤案还是石沉大海。对林语堂来说,林惠元是侄子,对杨骚来说,林惠元是好朋友,但这场抗争却不是私人恩仇,这是正义同邪恶的斗争,当正义被绞杀了,他们能沉默无语吗?在邪恶的面前,当年他们曾同是正义的卫道者,一起发出了呐喊的强音。

岁月茫茫,往事如烟。杨骚比林语堂迟4年多才来到这个人世间,却比他早了近20年离开。20年,不知能在这个人世间走多远的路。林语堂出生在福建平和县的坂仔村,平和一家瓷厂烧了一种摆设的瓷盘,上头印着林语堂的头像,他手里拿着烟斗,表情很祥和。旁边有两行字,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林语堂语录:“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许多年前的话也同样适合表达如今开放社会的包容和务实。

林语堂的祖籍在漳州近郊的天宝镇五里沙村,这里仍埋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由于种种原因,他后来再没有回过家乡,没有在父母的墓前为身为牧师和基督徒的父亲母亲做做祈祷。幸好,假如有过遗憾,女儿替他抹平了。2002年4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和林相如回到五里沙村。在座谈会上,我见到了她们。她们姐妹中,只有林太乙接过了林语堂的衣钵,写过小说,是闻名于世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她显得很疲惫,步履蹒跚,说话语音不亮。她在自己写的《林家次女》一书中,曾引用美国作家沃尔夫的话“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因为人事景物已经全非。但是她还是回来了。某种意义上说,她回来,也代表了林语堂回来。2011年10月,我在林语堂出生地平和县的一次文学活动中同林相如又相遇。我谈起一些往事,但她对文坛的事似乎很疏远。

我到过台北林语堂故居,他的坟墓就在这里。参观时,我心里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林语堂仍在,他会回家乡吗?也许,会的。

(作者单位:闽南日报社)

## 李代桃僵话柏英识

——林语堂初恋情人考 □ 陈煜斓

1974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八十自叙》,这是林语堂要用笔将自己完整的一生画上个句号。书中写道:“我以前提过我爱我们坂仔村里的赖柏英。小时候,我们一齐捉螃蟹,捉虾,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的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这里的“提过”,所指的是1963年由美国世界出版公司(The World Publishing)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Juniper Loa)。严格来讲,这部小说更多的是流露出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但故乡的那个外号“小橄榄”的赖柏英在林语堂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她柔情似水,纯净无瑕,在情窦初开的岁月里,到处都是恋人甜美的歌声,温暖的阳光,少男少女嬉戏的身影,青梅竹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她,勤劳、能干、善良、孝顺、坚忍、敢做敢为……

林语堂早年的生活中确有赖柏英其人。赖柏英的家原先就在离林语堂出生的小屋不到500米的地方。但生活现实中的赖柏英非艺术形象中的赖柏英。林语堂心中的赖柏英,就像坂仔的山和水,那样淳朴、自然,使林语堂无限深情的怀念,终身难忘。然而,林语堂写《赖柏英》时年近70,已有整整50年不曾到过坂仔了,年届80才写《八十自叙》,原本是要做一个美好的回忆,但难逃自然规律的消磨,对儿时的记忆有些朦胧,朦胧得记不住初恋的真名实姓。因为林语堂离开家乡时,赖柏英才一两岁,不可能有和她青梅竹马之恋以及准备带她走出大山之说。

**从时间看,与赖柏英感情的不合理性**

在平和坂仔镇林语堂文学馆旁,林语堂的出生屋是后来在原址翻建的。赖柏英家的祖屋早就毁了,如今老宅基上的房子易主了。从查阅族谱到咨询老人得知,赖柏英有兄妹七个,按顺序排列是赖天柱、赖天启、赖桂英、赖天兴、赖天赐(早夭)、赖柏英、赖明月。

2005年,有林语堂研究者拜访过仍还健在、已满88岁的赖明月老人。

她回忆说:“我二姐大我4岁,个子比我高,有近165厘米,脸尖漂亮,身材匀称,比我漂亮多了。”这就是说,此时的赖柏英应该是92岁,也由此可推算出她生于1913年。这与赖柏英的儿子蔡益昌的说法相一致。他说:“母亲死于1967年,当时55岁。”

林语堂出生于1895年,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毕业。1914年林语堂爱上了上海圣玛丽女校美术系学生陈锦端,从此后与村姑的情感由厦门首富的千金大小姐所替代,一直到后来与廖翠凤结婚,都不曾有那个“已经成长,有点儿偏瘦,所以我们叫她‘橄榄’”的人出现了。

那么,林语堂书中所写的“我们长大之后,她看见我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返回故乡。我们俩都为我俩相配非常理想”,那个“理想”的人,肯定不是赖柏英。他们的年龄相差18岁,林语堂进上海上学时,赖柏英尚未出生,就算中途返乡一两次,她也仅仅一两岁而已。林语堂和赖柏英之间要发生恋情,有悖于常理。

### 从归属看,与赖柏英的生活不相符合

林语堂说他的初恋情人因为要侍奉失明的祖父而放弃与恋人走出大山,“嫁给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笔者查阅档案资料和走访赖柏英的亲属得知:赖柏英于1932年嫁到平和县小溪镇坑里村下坂社,丈夫叫蔡文明,原名叫蔡启新,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厦门一所中学教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平和县。

至于作为当时平和县为数不多的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蔡文明为何会跟赖柏英结婚?赖柏英三哥的儿子蔡益中说:“当时我们的家族有土地,是坂仔镇的名门望族,我姑姑赖柏英又读过女子学校,她嫁给蔡文明也就符合常理了。”还有赖柏英的妹妹所说的赖柏英很端庄美丽,那么她跟蔡文明的婚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赖柏英和蔡文明育有一女三子:蔡阿玲(已去世),大儿子蔡益琛(孤身一人),二子1968年上吊自杀,小儿蔡益

昌,(生有一儿一女)。1967年夏天的一天,生产队通知赖柏英,说第二天要批斗她,她就选择了自杀。赖明月说姐姐是跳水自杀。蔡益昌说母亲是吃断肠草死亡的。

赖柏英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很深的历史印记,这与“她嫁了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不相吻合。

### 究竟谁是林语堂的初恋情人

与林语堂年龄相仿的是赖桂英。二妹代替了大姐,桂英成了柏英,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赖桂英。赖明月老人非常明确地表达“是我大姐”的看法。她回忆说“我的母亲就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两家就跟着亲戚似的,我们应该叫林语堂五叔。”“五叔”在这里的辈份关系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年龄差距。赖益中讲到的也是这个意思:“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我的大姑妈赖桂英,我大姑妈出生在1898年,今年107岁了,跟林语堂相差3岁。”

赖桂英嫁给了一个当地名叫林英杰的人,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早年开有典当行,日本人进入平和后,改当屠夫。这符合林语堂所说的“她嫁了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的说法。林英杰做屠夫后,开始变得性情暴躁,解放之初,又背上了“富农”成分,精神完全失常,而且发展到经常打人,小孩子都很怕他。赖桂英和林英杰生有三女,后来又抱养了一个女儿,叫庄亚珍,长大成人后嫁到当地下尾社。

庄亚珍现已病逝,之前的接触中,她多次讲到其养母跟她感慨:“如果我当时嫁给林语堂,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凄惨。”而且,她还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赖桂英的外号叫“橄榄”(即橄榄的意思,闽南语发音“故椎”),恰好与“我们叫她橄榄”的说法一致。庄亚珍的丈夫林江汉补充了一个细节:“丈母娘71岁那年的一天,因琐事与我发生激烈争吵,老人边哭边诉:都怪我命不好,才嫁给一个疯子,若当年跟和乐(林语堂上大学前的名字)走,我也不会像今日这般凄惨!”夫妻俩如今已经搬到漳州市区糖厂附近居住,生活很清贫,但坚决不要任何采访费,而且一再感谢我们能为其

澄清事实。这种当事人的回忆,笔者认为可信度较高。

据家住漳州市区的林土明先生介绍,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他6岁到14岁这个期间,家住平和坂仔教堂附近,跟赖桂英有过长时间的接触。据他回忆,小时候在他眼中,身高约165厘米的赖桂英端庄淑雅,说话温柔,“是一位极富魅力的山乡淑女”。林土明经常到赖桂英家玩耍,赖桂英给他讲过一些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她跟和乐的爱情故事。她说为什么和林语堂一起离开平和:“我只是在铭新小学读了几年书,他已经是个坂仔少有的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我真的太爱他,我不能拖累他,最后我以要照顾爷爷为借口,痛苦地选择了与他分手,让他安心地出去。后来知道他有了出息,我暗自高兴,当时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文革”期间,她把家中的一些旧瓷器、旧书籍送给林土明,并告诉他每件物品的来历,让他好好保管,其中就有林语堂送给她的三本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四书正义》。正在大城市求学的林语堂送给心仪的几本正在流行的书,用以勉励其读书,从理论上说得通,从情感上也可以接受。问题是,林土明所藏的这几本书,是否由林语堂所赠,又是否是赠给赖桂英的不能轻易断定,藏书中查不出任何与林语堂或赖桂英相关联的印证。因此,这份所谓“林语堂送给初恋情人的一份礼物”之说,不可为证。笔者倒是觉得赖益中的说法可以作为旁证:“我看了《赖柏英》这本书,觉得有很明显的我的家族的影子,赖柏英这个人,应该是指赖桂英,我听我母亲讲过我的大姑妈,文中写到的事情跟现实中的我大姑妈说话和做事的风格都很像。”

考证到此,现实生活中的赖柏英,与林语堂笔下的赖柏英,无论是年龄还是形象、命运,都相去甚远。包括赖柏英的亲人在内的许多年长者,也都对赖柏英是林语堂初恋女友的说法持否定态度。合理推断,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赖柏英的姐姐赖桂英。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李代桃僵之事,笔者认为可能有如下原因:

首先是,时间跨度大,记忆模糊。林语堂晚年的记忆常有失误,如胡适是1917年7月回到上海的,9月到北京大学任职。林语堂在悼念胡适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和《八十自叙》中都将这一年误记为1918年。

其次是,少年时的男女情感如今已经沉淀为故乡情结了:“在黛湖我们有

山。可是我在你们那个地方,可没看见那样的山。我们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见的那种不像样子的山。我们那儿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动,能够诱惑人。峰外有峰,重重叠叠,神秘难测,庞大之至,简直无法捉摸。”而那位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闽南女子,最终定位为高地人生:“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头后有青天做陪衬,头发在风中飘动,就比平常美得多。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昂然挺立的。”“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赖于